

引导与生产：社区慈善的内生动力培育机理与路径

赵文聘 万志彬

摘要：社区慈善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在基层治理领域的重要实践载体，其有效运作依赖于“党建引领的引导逻辑”与“情感建设的生产逻辑”的双重驱动与有机互构。“党建引领的引导逻辑”在体系建构上依托党的组织网络，将政治势能转化为治理效能；在制度供给上通过规则设计，形成稳定可预期的行为规范；在氛围营造上借助文化叙事与仪式操演，培育社区共同体认同。“情感建设的生产逻辑”则通过情感动员实现个体情感到集体能量的汇聚；通过认同建构推动情感共鸣升华为道德共同体意识；通过关系重塑持续产出信任、互惠规范与社区韧性等社会资本。社区慈善所呈现的“引导—生产”互构模式，不仅在微观层面将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理念转化为具体治理实践，更在宏观层面实现了制度秩序与社会活力的统一，为构建兼具治理效能与人文温度的社会治理新范式提供了理论启示与实践路径。

关键词：社区慈善 内生动力 党建引领 情感建设

DOI: 10. 20280/j. cnki. cn33-1435/c. 2026. 01. 007

作者赵文聘，华东政法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教授（上海 201620）；万志彬，中共上海市徐汇区委党校基层治理教研室教师（上海 200233）。

一、问题的提出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树立慈善意识、参与慈善活动、发展慈善事业，是一种具有广泛群众性的道德实践”^①，要“引导、支持有意愿有能力的企业、社会组织和个人积极参与公益慈善

项目来源：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促进慈善事业健康发展研究”（编号：21&ZD184）、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青年项目“上海‘两旧一村’改造中基层协商民主的共识困境与长效机制研究”（编号：2025ECK004）。

① 习近平《之江新语》浙江：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第 252 页。

事业”^①。现代慈善事业追求的是个人价值与公益影响的有机统一。^②社区作为城市的基本单元,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期盼和梦想,而社区慈善则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价值取向的重要实践路径。社区慈善是在城乡社区范围内,在社区党组织的领导下,以社区为主体,发动社区群众、社会组织、社会工作者、社区志愿者等力量,广泛链接社区内外慈善资源,积极开展慈善服务活动的一种公益慈善形态,也是中国特色慈善事业的基础^③。社区慈善具有离群众最近、联系群众广泛、最贴近群众生活等特点,能快速识别群众需求,还能通过社区基金会集聚社区资源、承接政府职能^④,精准设计匹配慈善项目,在推动基层减负的同时有效解决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问题^⑤。

社区慈善作为扎根基层的社会公益形态,其在促进社会和谐与实现共同富裕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是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一环。社区慈善已经超越了单纯的物质帮扶范畴,其运行过程深度融合了情感动员、社会资本增值与共同体意识培育等要素,通过整合社区内外的资源和力量,不仅能够有效应对社区发展中的各种挑战,还能促进社区的有机团结,不断提升社区生活品质和社区文明程度。那么,社区慈善如何有效激活居民的主体意识与互助潜能,形成持续不断的内生动力,在服务递送与关系建构中实现基层社会的善治?在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可以形成何种科学逻辑和路径?本文将聚焦社区慈善的内生动力培育机理和路径,剖析社区慈善如何与党建引领和情感建设融合,并重塑基层治理的新格局。

二、内生动力:社区慈善的根本依托

社区慈善可持续发展不仅依赖外部资源输入,更在于激发社区的内生动力。内生动力指的是社区居民基于对家园的认同感、归属感与共同价值,自发产生并持续维系的参与意愿与集体行动能力。形成坚实的内生动力,既需要党建引领提供清晰的方向与坚实的制度框架,也需要通过持续的情感建设将软性的连接深化为牢固的协作网络与内在的认同,从而实现社区慈善自主的健康发展。

(一) 社区慈善的内生动力

“内生动力”这一概念,最初在经济学中被用来形容一个经济系统依靠内部要素(如技术、人才和创新)实现自我驱动和持续增长的能力^⑥,其核心在于发展能量源于系统内部,而

①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39页。

② 陈可鉴、郁建兴《慈善的性质与模式》,《南京社会科学》2015年第5期。

③ 郑功成《中国特色慈善事业的理论建构与实践发展》,《公益研究》2025年第1期。

④ 徐家良《中国社区基金会关系建构与发展策略》,《社会科学辑刊》2017年第2期。

⑤ 叶李、吴结兵《共同生产视角下志愿服务参与基层减负的作用机理与实践路径》,《公益研究》2025年第3期。

⑥ 赵新亚《我国现阶段经济增长机制与宏观调控》,《江苏社会科学》1995年第1期。

非单纯依赖外部输入^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激励人民群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内生动力,对人民群众创造自己的美好生活至关重要”^②。“内生动力”的核心是要依靠人的主体性、参与性和创造性。群众自身的能动性是发展的根本基础,而由群众在日常互动中形成的社会关系,构成了发展的内生动力。正如列斐伏尔所言,“日常生活是所有活动的基础。正是在日常生活中,产生人类和每一个人的关系总和有了整体的形态和形式”^③。个人慈善行为是道德实践,源于个人的自愿与仁爱之心,通过捐赠或志愿服务等方式,无偿地向社会与他人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而社区慈善将这种个体的善念,深化为根植于基层日常生活的集体实践。社区慈善是集体公益慈善行动^④,如果缺乏内部成员的广泛认同、主动参与和持续投入,就无法形成真正扎根社区、回应真实需求、充满活力的慈善生态,其健康持续发展不能仅靠外部资源输入或行政指令推动,而是更需要激发社区内部居民的主体意识、参与热情和自我组织能力,即培育社区自有的、可持续的慈善内生动力。

当前,社区慈善范畴正不断拓展到为社区提供教育、文化、健康、环保等多元内容。2023年,民政部印发指导意见,着力推动形成“政府救助和慈善帮扶协调配合、资源统筹、优势互补、融合高效”的新格局^⑤。社区慈善凭借其贴近群众、反应迅速、形式灵活的天然优势,能够有效弥补常规基层治理类工作在覆盖范围和响应速度上的不足,从而织密民生保障安全网^⑥。社区内的慈善文化强调普遍性、广泛性和直接性^⑦,承载着中国传统的慈善文化基因,它生动体现了儒家“仁爱”、道家“为善”、墨家“兼爱”等思想,以及邻里互助、由近及远的传统实践。通过现代社区中的乐善好施、邻里帮扶,传统慈善文化得以弘扬和活化,居民的慈善意识与文化自信得以增强,达到增强社区凝聚力和促进社会和谐的效果^⑧。然而,一个必须正视的现实是,许多城乡社区正面临社会联结减弱、人际关系陌生化与情感疏离的挑战。社区慈善若仅停留在事务性项目层面,其效果和可持续性将大打折扣。社区慈善必须深入情感建设与关系重构的层面,将慈善活动转化为培育社区认同、信任与归属感的社会生产过程。只有当居民在互助中感受到温度、在参与中建立起联系、在贡献中实现了价值,慈善才能从外部安排的活动,内化为社区生活中自然而然、自我延续的组成部分。

(二) 社区慈善动力培育的“引导—生产”逻辑

中国式基层治理更加注重情感与组织的互构关系,强调党组织在情感引导中的核心作

-
- ① 周晓红《增强经济运行内生动力亟须改革提速》,《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5年第2期。
 - ②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441页。
 - ③ 亨利·列斐伏尔《日常生活批判》第1卷,叶齐茂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90页。
 - ④ 谢琼、魏博《公益促治理——本土化社区公益慈善发展中的问题及其应对》,《行政管理改革》2024年第9期。
 - ⑤ 参见《民政部关于加强政府救助与慈善帮扶有效衔接的指导意见(民发〔2023〕46号)》。
 - ⑥ 赵文聘《新时代社区公益慈善的逻辑定位与推进维度》,《社会保障评论》2024年第5期。
 - ⑦ 周秋光、万佳敏《中国慈善文化的历史演进、社会作用机制与当代发展挑战》,《公益研究》2025年第2期。
 - ⑧ 王名、王颖《社区慈善论纲》,《中国非营利评论》2024年第2期。

用。基层党组织通过“权力结构的一体化运作、党建元素的标识性感召、党群动员的人格化示范”的三重权威塑造机制^①,触发居民的情感性政治认同,从而塑造坚实的治理权威。党建引领与情感建设的结合,既是中国基层治理实践的鲜明特征,也是推动治理持续深化的必然路径,二者共同融合、相互促进,为社区发展注入坚实而可持续的内生动力。这种内生动力体现在三个层面上。一是结构性动力。党组织提供情感动员的结构性载体,使情感能够转化为持续性的集体行动。^②通过多元联结的结构性安排,实现政党—政府机制联结、支部—党员组织联结、政党—企业资源联结以及政党—群众情感联结的有机统一^③,为情感动员提供畅通的制度通道。二是技术性动力。党的群众工作传统为情感动员提供丰富的方法论资源。^④在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的当下,基层社区通过数字平台与智能工具拓展情感边界,在组织层面上改进党的工作方式、在技术层面上依托数字技术赋能、在情感层面上涵养善治意识^⑤,实现以科技连接信任^⑥。三是文化性动力。党建引领情感动员强调“以人民为中心”,注重回应居民的情感需求,通过社区共同活动中的符号生产、记忆建构与价值引导培育社区情感认同,利用文化资源激活居民的情感连接,形成居民的情感联结纽带^⑦。这些机制共同体现了从系统引导到有机生成的治理逻辑,即通过有组织的架构铺设、技术嵌入与文化塑造进行引导,进而持续孕育出具有凝聚力的情感关系与治理效能;而情感与效能的积累又反过来巩固和深化引导的基础,从而在上下循环中推动社区治理向更高水平的善治演进。

党建引领与情感建设共同构建了一个通过社区慈善来培育内生动力的机制。与西方理论中常见的“国家—社会”二元对立视角不同,中国社区慈善展现出政党引领与社会生长有机融合的特征,可被深刻阐释为党建引领的“引导逻辑”与情感建设的“生产逻辑”在社区中相互嵌入、彼此强化的结构化过程(见图1)。前者体现为一种顶层设计与制度性统合:党组织凭借其政治权威与组织网络,通过价值引领、议题设定与资源整合,为自发、弥散的情感能量提供制度化的疏导渠道与可持续的行动框架,从而将同情心与邻里情等原发性社会情感资本,有序地转化为指向公共福祉的集体意向性与共识性行动。后者则是一种内生动力与社会性建构:它根植于社区居民的日常互动,生产出诸如信任、归属感与共同体意识等强大的情感能量与道德凝聚力,构成社区慈善赖以生存的微观社会基础与心理动力。这两种逻辑并非简单并列,而是在“政党—社会”的互动中形成深刻的辩证统一:情感的生产为党的引

- ① 王浦劬、汤彬《基层党组织治理权威塑造机制研究——基于T市B区社区党组织治理经验的分析》,《管理世界》2020年第6期。
- ② 郭根、梁豪《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历史逻辑、制度密码与实践样态——超越“国家—社会”范式的分析》,《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2期。
- ③ 孙强强《统领型联结:基层党组织领导社区自治的实践形态与内在机理》,《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学报》2024年第4期。
- ④ 何得桂、党艳东《和合治理:党建引领基层善治能力提升的实践机制》,《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23年第6期。
- ⑤ 赵聪《数字党建赋能城市社区治理——基于组织、技术、情感的分析框架》,《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4期。
- ⑥ 徐家良《互联网公益:一个值得大力发展的新平台》,《理论探索》2018年第2期。
- ⑦ 潘博《党建引领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的内在逻辑与推进路径——基于共同体要素的分析视角》,《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5期。

导提供合法性根基与鲜活的内容供给,而党的引导则为情感的生产确保秩序方向与再生产的能力。“引导—生产”的双重逻辑统一体,超越了传统行政化治理的刚性窠臼与纯粹情感驱动的非稳定性,共同促成了社区慈善从感性冲动到理性坚守、从个体善念到公共善治的升华,生动展现了中国特色基层治理中制度与生活、政治秩序与社会活力有机互构的复杂实践智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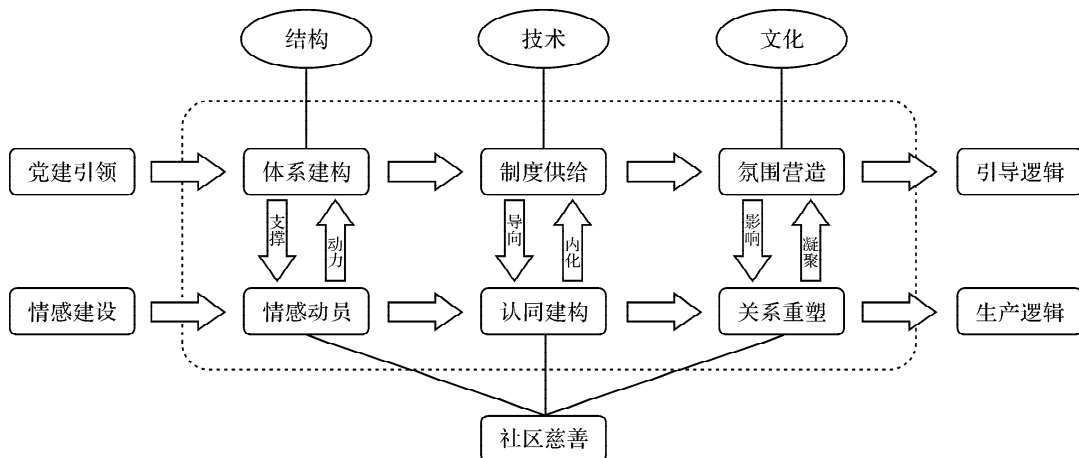


图 1 社区慈善内生动力培育机理

具体而言,引导逻辑通过“体系建构—制度供给—氛围营造”的三重路径展开:在体系层面,党的组织网络将政治势能转化为精准的慈善动员与资源整合能力;在制度层面,规则设计与激励机制为情感表达设定价值导向并构建稳定预期;在文化层面,叙事建构与仪式操演培育共同体认同与慈善文化。与此同时,生产逻辑则通过“情感动员—认同建构—关系重塑”的连续过程实现其效能:情感动员将个体同情转化为集体能量;认同建构将情感共鸣升华为道德共同体意识;关系重塑则持续输出信任、互惠规范与社区韧性。社区慈善的“引导—生产”逻辑构成了“结构—能动”的互构关系:党的引导为情感生产提供制度性载体与方向性指引,确保其不偏离公共善治的轨道;而情感生产则为党的引导提供合法性认同与持续动力来源,使其不致沦为僵化的行政指令。正是这种“引导—生产”的持续互动,使社区慈善超越了传统行政化治理与纯粹自发互助的局限,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基层治理创新范式。

引导逻辑与生产逻辑在实践中相互嵌入、彼此强化,形成了有机统一的内生动力。二者在实践中既发挥了党组织“统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优势,又充分尊重了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实现了“自上而下”的引导与“自下而上”的参与的完美结合。在组织架构与情感动员的互动中,党组织的严密网络为情感动员提供稳定平台与制度化通道,而情感资源的汇聚与公共转化则赋予组织以持续活力。尤其在数字化背景下,线上慈善新方式如社区数字平台、“时间银行”等正为这种互动创造着即时、透明的新联结形式。在制度规范与认同建构的互动中,引导逻辑通过明确的规则提供价值指引与行为预期,生产逻辑则通过实践将外部规范内化为道德自觉。当居民自发行为与既有制度出现矛盾时,关键在于通过协商

对话实现规范的动态调适,从而在约束与认同间找到动态平衡。在氛围营造与关系重塑的互动中,党组织通过文化治理塑造慈善生态,而持续的慈善实践则在其中再生产信任关系与社会资本。此外,在不同社区发展阶段,这两种逻辑的主次关系与融合方式可能呈现动态调整。在社区慈善的初始培育期,引导逻辑往往需发挥主导作用,以搭建基础架构、建立初始规则;进入稳定发展期后,生产逻辑则需日益凸显,推动慈善活动内化为社区习惯;而在转型提升期,二者需在更高水平上重新协同,以应对新的挑战或机遇。双重逻辑的互动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需要根据社区发展的具体情境进行适应性调适的。

三、党建引领: 社区慈善的引导逻辑

社区慈善的良性运作,并非居民个人情感的无序释放,而是需要党组织的引导的。社区慈善工作嵌入党组织的政治优势,并进一步细化嵌入组织优势、资源优势和群众工作优势,系统性地转化成为社区慈善事业的动员能力、整合能力与可持续发展能力。基层党组织扮演着核心能动者的角色,通过其强大的组织体系、精准的制度供给以及有效的社会氛围营造,为情感能量的激发与汇聚提供不可或缺的导向、航道与势能。引导逻辑本质上是将潜在的、分散的、非正式的利他主义冲动,系统地转化为持续的、有组织的、具有公共价值的集体行动的过程。

(一) 体系建构: 打通情感动员与资源整合的结构化渠道

党的组织体系构成党建引领逻辑在社区慈善场域中展开的物理性基础与制度化载体。在社区中,基层党组织绝非悬浮于社会肌理之上的机械科层,而是一个深度嵌入社区日常生活的有机网络,兼具政治引领、社会动员与资源整合的多维功能。党组织通过其精密的层级结构与广泛的节点分布,构建了一个以党组织为核心、多元主体共生的社区慈善生态系统。如深圳市南山区花果山社区通过“拓荒牛”微基金等枢纽平台将多元主体组织起来,再通过项目化、机制化的运作让情感与资源流动起来,最终形成一个能够自我维持、自我强化的社区慈善生态系统,这正是激发社区内生动力的结构性基础。^①党组织的引导是贯穿其中、确保系统有序运行并始终朝向公共福祉迈进的根本逻辑,为社区慈善的情感动员与资源流动构建起制度化的传导路径,确保社区慈善工作能够在有序的框架内运行,并最终服务于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目标。

第一,党的组织网络通过其“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体制优势,主导着社区情感共识的塑造与动员过程。从社区党组织到网格党支部,再到楼栋党小组及党员中心户,这一垂直贯通、水平覆盖的体系,确保了党的政治意志与组织影响力能够有效穿透社区治理的微观单元,直接触达个体居民。在社区慈善实践中,组织网络首先发挥着情感感知与共识建构的引导作用。基层党组织通过民主集中制、“双报到”、党群同心圆等机制将党员作为嵌入群众生

^① 王志明《“小慈善”书写“大治理”——深圳南山社区慈善绘就基层善治新图景》2025年10月30日, <https://www.duteneews.com/n/article/10201778> 2025年12月29日。

活的关键要素,其职责不仅在于传递政策信息,更在于主动识别和回应邻里的情感需求与公共关怀,将分散的、朴素的同情心升华为具有公共导向的慈善议题。党组织进一步发挥情感凝聚与行动组织的枢纽作用,依托其政治公信力与高效的组织能力,将这些源于日常、凝练成形的慈善倡议,迅速转化为广泛而有序的集体行动。过程中,党组织实质上为社区情感能量的释放确立了方向、框架与议程,从而将可能流于自发或短暂的情感表达,系统性地引导至理性、可持续且富有建设性的慈善轨道。当具体慈善项目启动时,党组织通过其层级化的动员网络,能将倡议高效传递至社区各个角落;其特有的公信力与组织效能,可有效克服信息壁垒、降低居民参与的心理与实际成本,进而将潜在的普遍同情转化为切实而稳定的参与行动。

第二,党组织体系依托其政治权威与组织信用,统筹进行跨部门、跨领域的慈善资源整合与战略性配置。现代社区中的资源,包括资金、场地、专业技能与人力资本等,往往分散于政府部门、市场主体与社会组织等多元主体手中,呈现碎片化状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从根本上决定了其追求公共利益和维护公共秩序的价值导向^①。基层党组织在社区慈善实践中发挥着核心整合与配置枢纽的作用,其引导逻辑集中体现为对资源流动方向和运用效能的战略性把控。依托上级街镇“大党委”机制、党建联席会议等制度化平台,党组织能够有效吸附、协调并重组来自各方的异质性资源,将其系统性地引导至社区慈善的公共议题之中。例如,通过政策引导推动公共服务资金定向支持慈善项目,借助政治协商促进企业社会责任捐赠与社区需求精准对接,利用组织联动引入专业社工机构以提升慈善服务能力。这些过程并非被动承接服务,而是一种以公共价值为导向、主动介入的资源塑造与赋能实践。通过建立规则、搭建平台、监督运行,党组织确保各类资源在社区慈善场域中得到高效整合与利用,从而为情感驱动的慈善行为提供可持续的物质支撑与能力保障。

第三,党组织作为一个常设的、制度化的核心,为社区慈善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稳定平台与系统性信任基础。情感的自然属性在于其流变性与情境性,若缺乏稳定的组织形态与之匹配,由此激发的慈善行动极易陷入“昙花一现”的困境。慈善组织作为联结组织属性和公众认知的信任纽带,其公信力源于利他性、专业性与问责性的组织形象。党组织的引导作用在此深刻体现为提供组织刚性并生产制度性信任。一方面,它作为可持续的组织保证,为社区慈善基金、公益创投项目、志愿服务队等各类慈善形态提供了合法的身份、规范的运作框架和可靠的骨干力量^②,确保了社区慈善不因领导人更替或注意力转移而中断。另一方面,党组织以其在长期政治实践中积累的公信力,为社区慈善活动提供了强大的信任背书。在社会信任度面临挑战的背景下,居民对慈善行为的透明度和实效性普遍存有疑虑。由党组织牵头、背书或深度参与的慈善项目,能够将群众对党的政治信任有效地转移到对具体慈善行动的信任上^③。从而显著降低公众参与的心理门槛和协调成本,极大地促进了社会资本的生成与聚合。发挥意见领袖、社区达人、新乡贤的作用,将分散的情感表达转化为有序

① 陈富国、黄晓妹《公共精神的中国生成:现代国家治理视界的论证》,《理论与改革》2016年第4期。

② 王木森、陈荣卓《党领共治:新时代社区治理动力的协同优势》,《理论导刊》2022年第12期。

③ Li P, Wang L, "Does political trust matter for charitable giving? The antecedence and consequence of trust in local officials," *VOLUNTA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Voluntary and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vol. 34, no. 6(2023), pp. 1160-1171.

的社区参与^① ,催化更深层次、更广范围的社会合作 ,使得大规模、常态化的社区慈善成为可能。

(二) 制度供给 形成理性化与规范化的行动范式

制度供给构成党建引领逻辑在社区慈善场域中实现价值塑造与行为规约的核心。党组织通过构建正式与非正式的制度安排 ,为情感建设的生产逻辑设定价值导向、确立行为边界、提供稳定预期并建立保障机制 ,从而引导社区慈善实现从感性冲动到理性坚守、从零散随意到规范有序的根本性转变 ,确保其发展符合公共价值并具有可持续性。作为西北地区唯一的全国首批社区慈善实验试点 ,酒泉市肃州区官北沟社区通过社区民主议事规程 ,将居民普遍关心的“一老一小”照护、邻里帮扶等事项 ,优先确立为社区慈善的核心领域。^② 制度供给确保了被激发的情感能量能够在制度的轨道上有序流动、高效转化 ,并最终凝结为社区慈善可持续发展的强大内生动力。

制度供给的首要功能 ,在于通过确立价值导向与议题边界 ,实现对个体情感的政治引领与理性化升华。自发产生的情感表达存在挑战政治秩序以影响决策的可能性^③ ,易导致慈善资源的配置失焦或群体间的认知冲突。党组织的引导作用在此体现为制度化的议程设置能力 ,即通过民主议事、协商决策等规范程序 ,将原本分散、朴素的情感关切 ,系统性地引导至符合公共利益与主流价值的慈善轨道。引导的过程本身就是对个体情感的理性化。社区党组织并非压抑或取代居民的自然情感 ,而是通过制度化的讨论、辨析与共识凝聚 ,帮助社区成员将源于个体同情心的原始情感 ,升华为对社区公共善意的自觉认知与共同追求。在此过程中 ,党组织通过制度这一载体 ,确保被激发的情感能量最终服务于构建社区共同体的根本目标 ,从而实现情感政治的有效引导。

在此基础上 ,制度供给通过构建清晰透明的运行规则与保障体系 ,奠定社区慈善的公信力基础与规范化框架。公信力是社区慈善的生命线 ,而其建立与维系完全依赖于健全的制度安排。党组织的引导逻辑在此体现为规则制定与监督执行的核心职能。通过牵头制定并维护社区慈善基金管理办法、物资流转规程、财务公开制度、志愿服务标准等一系列规章制度 ,党组织为慈善行为的全过程提供明确、统一的操作规范与价值标准。规则在社区慈善中具有特殊的治理效能。一是通过确立程序正义来保障结果正义 ,使每一笔捐赠、每一次服务都能在阳光下运行 ,从而巩固居民持续参与的制度信心^④。二是为所有参与者提供了稳定的行为预期 ,显著降低了因规则模糊而产生的内部摩擦与协调成本^⑤。三是构成了正式的

- ① 姜秀敏 《“草根领袖”何以推动社区微自治:居民主体性建构的行动框架——基于 Q 市 J 楼院自治的个案研究》,《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23 年第 6 期。
- ② 《【非凡“十四五”·幸福拼图】从“社区试验田”到“城市生态圈”——社区慈善助力基层治理的生动实践》2025 年 11 月 20 日 <https://mp.weixin.qq.com/s/i0IbU3MmMLcZ2VSTj9TFJQ> 2025 年 12 月 27 日。
- ③ 袁光锋 《公共舆论中的“情感”政治:一个分析框架》,《南京社会科学》2018 年第 1 期。
- ④ 吕鑫、王凌峰 《论慈善与正义》,《社会科学战线》2011 年第 9 期。
- ⑤ 朱力、葛亮 《“道德环”对构建中国慈善事业的启示》,《南京社会科学》2013 年第 3 期。

监督与约束机制,能够有效防范道德风险和“搭便车”行为^①。此外,制度供给还延伸至风险防控领域例如为志愿服务购买保险、制定应急预案等^②。这些保障性制度解除了参与者的后顾之忧,也为情感表达提供了一个安全、可靠的环境。

更进一步,制度供给通过设计创新激励机制与塑造稳定行为预期,有力推动社区慈善从短暂的情感驱动,转向可持续的规范主导发展模式。作为一种新兴的公益模式,社区慈善本身具有内在的波动性与脆弱性,其长期发展面临可持续性挑战。党组织通过制度设计,构建一套能够促进慈善行为持续再生产的动力生成系统。这包括在社区内建立时间银行等将他行为与未来收益相关联的互惠制度,设立涵盖积分激励、荣誉表彰、社区评价等多维度的认可机制,以及将慈善参与纳入社区信用体系等创新实践。体系化的社区慈善制度将他行为与合理的利己预期(包括社会资本积累、声誉提升、未来保障等)有机结合起来,从而形成“奉献—积累—回报—再奉献”的良性社会循环。稳定的正向激励,向社区居民传递出一个清晰而稳定的信号:善行不仅会得到当下的个人情感满足,还会在制度层面获得社区的长期认可与保障。由此,社区慈善得以从偶然的、情境化的情感释放,逐渐演变成为一种内化于日常生活的、可持续的生活方式与行为习惯,促成慈善行为的习惯化与常态化。

(三) 氛围营造 塑造共同体认同与慈善文化空间

在党建引领社区慈善的实践框架中,氛围营造代表着引导逻辑从显性的组织规制走向隐性的文化渲染,从外部动员走向内在驱动,最终实现慈善文化在社区土壤中的内生性发展。党组织通过系统性的文化治理与意义生产,着力培育富含同情、互助与共同体意识的社区精神生态,在文化意义与精神价值层面实现对社区慈善的深度引导,为情感建设与慈善行动构建一个具有深层意义的社会空间^③,而“社会空间就其本身而言,既是作品又是产品——是‘社会存在’的物质化”^④。空间营造虽无形却力量深远,它使慈善从外部的组织要求转化为内在的文化自觉,从偶发的行为片段转变为持续的生活方式,充分展现了党的领导在基层治理中的创造性实现。如北京市大兴区兴宇社区通过策划“为偏远山区儿童编织爱心织物”这类具有鲜明仪式感的主题活动,将慈善行动转化为情感凝聚的集体仪式。带着社区集体“温度”的织物跨越山河送往留守儿童手中,这不仅解决了具体需求,更在周期性重复的公益服务项目中,持续强化着居民“邻里互助、推己及人”的共同体认同,将社区物理空间成功塑造为一个有温情、有认同的慈善文化空间。^⑤

党组织通过主导性的叙事建构与意义生产,不断塑造并巩固社区慈善的价值共识与道德正当性。党组织作为社区意义体系的核心塑造者,善于依托多元传播渠道与文化载体,围

① 朱力、龙永红《我国现代慈善资源的动员机制》,《南京社会科学》2012年第10期。

② 刘蕾《重大突发事件中的慈善捐赠管理制度:焦点事件、注意力分配与政策调适》,《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5期。

③ 高灵芝《论慈善事业的社区化与社会化》,《社会科学研究》2004年第3期。

④ 亨利·列斐伏尔《空间的生产》,刘怀玉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20年,第149页。

⑤ 《天宫院街道兴宇社区作为北京市唯一代表社区入选全国社区慈善实验试点》,2024年2月22日, https://mp.weixin.qq.com/s/pj-jiC_3ifBnRIC9FjBD9w, 2025年12月27日。

绕“人人心怀慈善,人人参与慈善,我们的社会一定会更加文明、更加和谐”^①这一主线,构建富有认同感的集体叙事。通过系统挖掘与宣传身边的慈善典范、邻里互助事迹,将个体的善行有机融入社区共同体的故事脉络中,使个人的慈善行为被赋予超越单纯帮扶的社会意义。这不仅是对特定对象的援助,更是参与构建社区共同体的公共实践,是居民作为共同体成员的身份确认与价值表达。在此过程中,党组织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转化为可感知、可践行的日常生活伦理,为社区慈善提供深厚的价值依据与文化合法性,从而实现了对居民慈善认知与价值判断的柔性引导。这是在回应居民情感与社区所需的基础上,形成具有感染力和引导力的生活意义,使社区慈善在情感共鸣中得到价值认同,继而反哺于社区的慈善叙事。

同时,通过系统性地组织仪式活动与整合情感资源,党组织周期性地营造并维系着促进社区团结的情感氛围。共同参与的仪式是凝聚群体认同、激发情感能量的重要载体。依托自身的组织优势与资源协调能力,党组织结合社区实际,精心策划并主导开展各类社区慈善相关仪式,如邻里节、百家宴、慈善义卖、志愿服务启动仪式、先进典型表彰活动等,为居民营造出高互动、强共鸣的情感场域。在这些活动中,参与者通过共同关注、协作行动与情感共鸣增强了归属感。党组织在其中承担着情感调度与引导的角色。通过定期举办此类活动,社区不仅持续巩固社区内部的情感联结,还将由此激发的情感有序导入慈善实践^②。这种在集体参与中生成的情感共鸣,使居民在活动互动中切身感知共同体的存在,也让互助与奉献逐渐从理性认知转化为自觉的情感驱动。作为社区慈善文化中最活跃的滋养要素,这种集体情感显著增强了居民参与的持续性与内在动力,使慈善行为真正融入社区共同体的情感脉络之中,显著增强了居民参与社区慈善以及其他相关活动的黏性与持续性。

这些努力共同作用于深层文化基础的培育,通过滋养公共精神与重塑社会信任,为社区慈善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坚实的文化支撑。党建引领基层社会再组织化的核心目标,正是构建广泛认同的治理共识。^③面对社会个体化、原子化的现实挑战,培育居民的公共精神成为党组织推动社区慈善发展的深层文化使命。其引导逻辑体现为对社区价值生态的长期涵养:通过持续的价值倡导、公共空间的文化营造(如慈善文化墙、善行义举榜等),以及参与式协商机制的完善,潜移默化地推动居民从关注私人利益的个体,向具有公共责任意识的社区成员转变。这种公共精神的培育,是社区慈善从被动回应走向主动创造的重要心理支撑。^④当公共精神逐渐内化为社区的文化内核时,参与慈善便不再仅仅源于对他人困境的短暂同情,而升级为对社区共同福祉的自觉担当与积极建设。同时,党组织在氛围营造、价值引导和机制建设等方面的持续实践,最终积淀为社区内部弥足珍贵、普遍存在的高水平社会信任。这种信任显著降低了居民交往与合作中的不确定性,使慈善互助能够以更低的成本、更高的效率广泛开展,从而为社区慈善文化的繁荣与持久传承提供了坚实的社会心理根基。

① 习近平《之江新语》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53页。

② 朱健刚、邓红丽《治理吸纳慈善——新时代中国公益慈善事业的总体特征》,《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2期。

③ 赵文聘、万志彬《同心共治:党建引领基层社会再组织化的逻辑和路径——以A市D街道为例》,《学习论坛》2024年第4期。

④ 武涓宇《中国近代“公益”的观念生成:概念谱系与结构过程》,《社会》2018年第6期。

四、情感建设：社区慈善的生产逻辑

社区慈善的生命力,不仅源于制度化的引导与规范,更根植于其深层的“生产逻辑”,即情感作为内在驱动力,持续不断地生产出维系和推动慈善行为所必需的能量、意义与社会联结。生产逻辑将社区慈善从单纯的资源再分配方式,提升为一种充满活力的社会共同体形成模式。它关注的是,在党建引领所创设的平台上,个体与群体的情感如何被唤醒、被引导与升华,并最终转化为构建共同体的强大力量。情感源于人与人的关系,其真正价值不在于创造有形之物,而体现于它所激发的道德感、凝聚的集体认同以及所催生的新型社会关系。

(一) 情感动员：从个体行为到集体行动的转化

情感动员是驱动社区慈善运转的核心机制。通过系统性的引导,它能够将居民及其他主体内心那些潜在、分散且私密的主观体验,有效地凝聚、转化并升华为具有明确公共指向的集体慈善行动。这一过程深深植根于社会生活的基本结构之中。如滕尼斯指出的,“对整个民族而言,最重要的风俗同家庭生活里的各种大事件联系在一起,即初生、结婚与死亡”,而且“与各个家庭毗邻地共同生活着的邻人也不自觉地参与其中”^①。这种由生命礼仪与日常毗邻所自然缔结的情感联结与社会参与传统,为社区慈善中的情感动员提供了深厚的文化基础与心理依托,使超越家庭的公共善行成为可能。如广州市番禺区大龙社区在深化“慈善之区”建设中,以乡村振兴为抓手,将日常的邻里互助行为,升华为“家人”的共同体宣言;将居民对社区环境问题的担忧,引导为“共建美好家园”的集体行动倡议。^②情感动员并非简单的线性传递,而是一个包含多重环节的复合型系统。其根本目标,是实现情感资源的社会化组织与持续再生产,从而完成从个体微观情感到宏观社会效能的创造性转化。

情感动员的起点在于对社区内既有情感资源的敏锐识别,这构成了情感生产不可或缺的心理基础。在共同体中,“只有以享受、利益与幸福为取向的思想,才能推动着自愿行动的产生”^③。社区作为一个鲜活的情感场域,蕴藏着丰富而复杂的情感资源。其中既包括对弱势群体的同情与关怀,也包含对公共事务的关切与焦虑;既有对社区传统的怀旧依恋,也有对未来发展的热切期待。情感动员的首要环节,是借助党群联系网络、社区议事平台等,对这些原生、非结构化的情感事件进行敏锐的识别与采集。随后,通过活动、仪式的加工,将这些通俗意义上的宣传报道转化为可传播、可共鸣的公共符号与叙事主题。此过程本质上是一种基于情感的话语加工,它将私密、具体的情感体验,转化为具有道德感召力和集体认同感的公共议题,从而为激发情感共鸣、促成一致行动提供了必要的文化内容与认知框架。

① 斐迪南·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纯粹社会学的基本概念》张巍卓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20年,第407页。

② 《慈善月记 | 善暖金秋 久久为功》2025年11月10日 <https://mp.weixin.qq.com/s/8yjbcAotzsBBElHiQzoHUw> 2025年12月27日。

③ 斐迪南·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纯粹社会学的基本概念》张巍卓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20年,第241页。

在此基础上,其核心环节是通过精心设计的组织化互动仪式,规模化地激发并强化参与者共享的情感体验。集体情感的形成通常依赖于共同在场、焦点集中、情感交流与群体边界等条件。在社区慈善中,由党组织主导或支持的各类活动,如公益嘉年华、志愿服务启动仪式、邻里互助节等,正是为此类互动提供的有组织载体。在这些活动中,参与者通过共同在场、协同行动(如集体宣誓、共同劳动)、故事分享以及对公益目标的共同关注,实现情感的传递与增强。有效的互动仪式能够产生显著的集体情感与共同记忆^①,进而形成具有群体归属感、道德认同感与社会参与感的心理动力。这种集体情感是推动持续参与慈善的关键因素,它使个人的善意行为从基于责任意识的“我应做”,逐渐转变为源于情感认同的“我愿做”。参与者从中获得超出个人利益的满足感,从而使慈善行为从一种道德约束转化为一种情感体验,实现“无条件、在任何环境下都去做那些正确的事情:美好的、善的、高贵的事情”^②。例如,在结合主题党日开展的社区慈善活动中,通过引导情感表达,能够有效增强参与者的身份认同、相互信任和社区归属感。^③通过定期举办此类活动,社区能够持续巩固共同体意识,保持情感动员的规模与稳定,从而维系慈善行动的长期活力。

最终,情感动员的可持续性有赖于构建有效的情感反馈与价值循环机制,从而实现情感资本的不断积累与动态增强。情感的激发若缺乏后续的维系和转化,很容易随时间减弱。因此,成熟的情感动员体系内嵌了一套系统的反馈与再生产机制。这包括对慈善行动成果进行及时、透明、可视的反馈。如公示项目进展、分享受助者的改变故事,使参与者能直接感知自身情感投入所产生的社会价值,从而获得强烈的成效感与意义感。同时,动员体系还通过社会认可、荣誉激励、象征性表彰(如慈善荣誉榜、志愿服务积分)等形式,将情感转化为可积累的社会资本与象征资本。这种正向反馈一方面验证情感投入的实际效果,增强参与的意义感,另一方面,又持续生成更深厚的社会信任、社区自豪感与群体归属感,继而激励更深入、更持久的情感投入。由此,社区慈善便形成一个“情感投入—行动产出—价值反馈—情感再投入”的良性循环。在这一过程中,情感资源不仅不会被消耗殆尽,反而能在使用中不断积累和强化,从而为社区慈善的持续发展提供稳定的内生动力。

(二) 认同建构,从情感共鸣到道德共同体的意义生产

在情感主导下,“我们的举止、行为及话语都只是我们的生命力及本性的一种特殊表达”^④。居民对慈善组织的信任与否取决于是否能够产生道德认同。^⑤在社区慈善的情感生

- ① 王鹏、林聚任《情感能量的理性化分析——试论柯林斯的“互动仪式市场模型”》,《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
- ② 斐迪南·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纯粹社会学的基本概念》张巍卓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20年,第256页。
- ③ 潘博、王立峰《小型互动仪式链:党建引领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的情感表达——基于对“跟党走”类主题活动的考察》,《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2期。
- ④ 斐迪南·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纯粹社会学的基本概念》张巍卓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20年,第255-256页。
- ⑤ Bekkers R, Wiepking P, “A Literature Review of Empirical Studies of Philanthropy: Eight Mechanisms that Drive Charitable Giving,” *Nonprofit and Voluntary Sector Quarterly*, vol. 40, no. 5(2011), pp. 924-973.

产体系中,认同建构代表着其最高层次的生产形态。这一过程旨在将因特定事件激发的即时性情感共鸣,通过系统性的意义赋予与价值引导,沉淀为稳固的共同体认同与道德责任感,从而实现从个体性的“我”,到集体性的“我们”的深刻转变。构建社会共同体的核心就在于形成情感上的共同体,而社区慈善正是这一构建过程的重要实践载体。其生产逻辑的目标,是使慈善行为成为共同体成员自觉的文化实践与价值追求。认同的产生不仅为社区慈善提供了持久的精神动力,更在更广阔的层面上塑造着现代社区治理的社会心理基础与文化生态。如上海市奉贤区奉浦街道作为全国社区慈善实验首批试点之一,提出了“人人争做美好生活供应商、人人成为美丽家园建设者”的目标。^①在这一叙事引导下,居民、商户、企业等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创造“百万基金牵引社会力量,百个小屋链接服务场景,百万积分循环激励参与,百个治理项目激活自治动能”的联动机制,将慈善有机融入“15分钟社区生活圈”建设,切实推动居民美好生活愿景的实现。

认同建构首先通过系统化的共同叙事来凝聚价值共识,为共同体奠定认知基础。分散的情感体验需要被整合进连贯的意义框架,才能凝聚为稳定的集体认同。在社区慈善实践中,党组织承担着意义建构的核心角色,通过建立完整的社区慈善叙事,实现对情感的符号整合与价值提升。这种共同叙事建构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历史根基的构建,通过挖掘社区的互助传统或共同经历^②,为情感认同提供历史延续感;二是价值规范的塑造,将邻里互助、共建家园等理念确立为社区共享的道德准则^③,为慈善行为赋予伦理正当性;三是榜样符号的树立,通过宣传慈善典型人物与事例,提供可参照的行为示范^④;四是未来愿景的描绘,展现通过集体慈善可实现的社区发展图景,为持续参与指明方向^⑤。认同将个体的慈善行为,从孤立的事件重新定义为参与共同体建设的积极实践,实现了从情感表达到价值认同的深化。

进而,认同建构通过塑造清晰的道德边界与伦理责任,不断增强共同体的内在凝聚力与归属感。个人慈善行为的发生是道德情感、道德理性和道德责任共同作用的结果。^⑥在社区慈善实践中,通过持续的道德边界构建,逐渐形成了以互助为核心的共同体认同。通过持续的慈善实践,在社区内部建立起基于共同伦理责任的内向凝聚力。随着居民持续参与慈善活动,他们会逐渐形成对共同体成员,特别是对弱势群体的道德责任感。这种责任感超越了简单的利益考量,逐渐内化为一种自觉的伦理意识。当邻里遇到困难时,提供帮助被视为应尽的义务,而非额外的善意行为。这种伦理共识的形成,显著降低了社区治理的协调成本,使互助行为变得更自然、更顺畅。最终,这一过程产生强大的道德凝聚力,它将生活在同

① 《奉浦街道:以“全生命周期”治理创新践行人民城市理念》2025年6月6日, <https://mp.weixin.qq.com/s/QqXkDvO41H5n1wlhHeufuw> 2025年12月27日。

② 谢琼、谷玉莹《结构—机制—行动:社区慈善及其内生动力的发展机理》,《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2期。

③ 孙春晨《第三次分配的伦理阐释》,《中州学刊》2021年第10期。

④ 周中之《当代中国慈善伦理的价值及其理论建构》,《齐鲁学刊》2013年第1期。

⑤ 谢琼、魏博《公益促治理:本土化社区公益慈善发展中的问题及其应对》,《行政管理改革》2024年第9期。

⑥ 武晓峰《情感、理性、责任:个人慈善行为的伦理动因》,《道德与文明》2011年第2期。

一物理空间中的个体 转化为在道德上紧密相连、彼此承担责任的命运共同体。

认同建构的深层目标在于 通过持续的慈善实践本身来“生产”美德,从而实现道德主体的自觉养成与共同体的活态再造。持续参与社区慈善本身是一种社会学习与道德内化的过程,居民在反复的慈善实践中,学习如何同情、如何负责、如何协商、如何合作。这个过程遵循着从外到内、从行为到认同的转化逻辑。初始阶段可能由外部氛围带动或从众心理驱动的慈善行为,随着参与的深化和积极情感反馈的累积,会逐渐内化为稳定的价值观念和行为习惯,即生产出现代公民所必备的美德^①。这些美德包括公共理性、同情心、正义感、信任与合作精神等。此时,参与社区慈善对个体而言,便超越了单纯响应外部号召的被动行为,转而成为满足其实现社会价值与自我完善的一种内在需求。“人性化的人,是通过行动和在实践中,即在日常生活中形成的。”^②情感建设在推动认同建构的过程中,恰恰生产出了社区最为宝贵的产品,即具有公共精神与实践美德的积极公民。这些公民不仅仅是社区慈善活动的参与者,更是健康公共生活与良性社区治理的自觉创造者,为中国基层治理的现代化转型提供了最为坚实的社会主体基础。

(三) 关系重塑 从慈善互动到社会资本网络的编织

情感建设的生产逻辑,其作用不仅停留在心理和文化层面,更深刻地体现在社会结构的微观重塑上。社区慈善作为一种高度组织化的互动形式,其意义在于持续地将邻里间偶发、随机的接触,转化为稳定、可持续的社会联结;将瞬间的情感共鸣,沉淀为结构性的合作能力与集体行动网络。在激发居民参与社区慈善的情感中,通过持续的关系性实践,系统性地生产着信任、互惠规范与社会网络等核心社会资本要素,从而实现对社区社会结构的韧性增强。良性的慈善互动在社区回应居民诉求的过程中逐步建立起信任^③,这也是其作为一种生产逻辑最直观的体现。如武汉市武昌区户部巷社区的“户部巷人家慈善联盟”通过社区党组织有效引导,将最初个别的商户或居民的善意举动,汇聚发展为涵盖景区商家、社区居民、街区管理机构等多方主体的12支志愿服务队。通过常态化的联合公益行动,原本局限于各自领域的商户与居民、景区经营者与街区管理者之间,建立了稳定的信任与合作纽带。最终,慈善联盟成为一个强有力的关系平台,将在地的商业资源、邻里情感与治理支持编织成一个协同共生的“社区慈善共同体”,显著提升了整体社区的韧性与凝聚力。^④

社区慈善最基础的生产体现为普遍化信任的系统性产出。信任作为社会资本的核心要素,是社区合作的基础,也是在社区慈善的具体实践中被持续生产和积累的。在社区慈善的场域中,信任以两种方式被大规模生产出来。一方面是制度性信任的生产路径,即居民基于

① 高红、窦正斌《中国社会现代慈善理念的匮乏与培育》,《东方论坛》2007年第6期。

② 亨利·列斐伏尔《日常生活批判》第1卷,叶齐茂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146页。

③ Yang K, “Public Administrators’ Trust in Citizens: A Missing Link in Citizen Involvement Efforts,”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vol. 65, no. 3(2005), pp. 273-285.

④ 《百年老巷的“社区慈善实验”》,2025年11月12日, https://mp.weixin.qq.com/s/2M_ZPvcIuh1BsPqnanFt_Q, 2025年12月27日。

党组织领导下的慈善项目运作的规范性、透明性和有效性而产生的信任。^① 这种基于制度可靠性的信任,构成了社区合作的刚性基础。另一方面是人际信任的生产路径,即在共同的慈善活动中,居民之间、居民与社区组织者之间频繁的、正向的互动,打破了现代社区常见的陌生感与隔阂。^② 人们在协作中增进了解,在互助中建立情感联结,从而形成可靠的人际网络。这种由重复、成功合作所生产出的信任,不仅能降低未来集体行动的成本,而且其本身就能带来一种安全感与幸福感,提升了社区生活的质量。

通过制度化的慈善互动,社区慈善还能够持续生成互惠规范与紧密的关系网络这两类关键社会资源。慈善行为表面上是单向的资源转移,但在良性运行的社区共同体内,其实际功能是建立并强化一种普遍化的互惠原则。参与者提供帮助时,并非追求即时、直接的对等回报,而是基于一种社会信任即相信当其自身产生需求时,社区及其他成员亦会提供支持。这种信任机制构成了社区集体安全保障的心理基础。诸如时间银行、技能交换等制度化的慈善形式,将这种互惠预期转化为可见的、可积累的社会信用,促使互惠规范从隐性共识发展为显性制度。同时,慈善活动中的每一次互动都在构建和巩固社会关系。^③ 无论是志愿服务中的协作讨论,还是社区募捐中的直接交流,均持续促进社会联结的生成与强化。这种高频次的互动不断拓展新的社会链接,增强现有关系的稳定性,最终形成一张高度互联且具备弹性的社区支持网络,继而使之成为一种社会责任和公民义务^④。基于社区共同体形成的社会网络不仅是情感依托的载体,更为信息传递、机会共享与资源配置提供了高效通道,从而提升社区应对内外部压力的整体韧性。

这些资源汇聚的最高级产出,则体现为整个共同体应对内外挑战的系统韧性,这也是社会资本最重要的形态。通过社区慈善实践所积累的高密度社会资本,包括普遍化的信任、制度化的互惠规范以及密集的关系网络,最终汇聚升华为一种宏观的社会性产品,即社区共同体的系统韧性。这种韧性源于“在经受了各种分离与分割的肢解之后,社会统一体为了一般的再生产,并以一般的再生产为手段,而能够在家庭单位的层面上重构自身”^⑤。一个拥有丰富社会资本的社区,在面对外部冲击(如自然灾害、公共危机)或内部紧张(如居民矛盾、征收动迁)时,能够展现出显著的适应、恢复和创新能力。相关研究表明,社区的慈善组织与志愿者在突发事件中发挥极为重要的作用。^⑥ 居民之间通过长期慈善合作培养的信任基础与协作习惯,使他们能够迅速自发组织起来,进行有效的自我管理和互助救援。于日常慈善实践中培育的公共精神与集体行动能力,便转化为抵御风险的缓冲机制和推动重建的社会动力。因此,社区慈善的情感生产逻辑,其最终产品远不止于即时的慈善成果,更在于为整

① 朱力、龙永红《我国现代慈善资源的动员机制》,《南京社会科学》2012年第1期。

② 邓玮《城市居民慈善意识影响因子分析及动员策略》,《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3期。

③ 贺东航《地方社群传统与政府主动性——福建晋江慈善总会构建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启示》,《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5期。

④ 陈勇《慈善文化与和谐社会建设的伦理思考》,《伦理学研究》2006年第3期。

⑤ 亨利·列斐伏尔《空间的生产》,刘怀玉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20年,第342页。

⑥ 郑功成《中国慈善事业发展:成效、问题与制度完善》,《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20年第6期。

个社区锻造了一种面向未来的、可持续的、坚韧的生存与发展能力。这种深植于社会关系的共同体韧性,是社区慈善生产逻辑所贡献的最具战略意义的公共产品。

结 语

“引导—生产”的双重逻辑并非简单并列,而是形成“引导逻辑为生产逻辑定向赋能,生产逻辑为引导逻辑注入活力”的辩证统一。两者共同合成为推动社区慈善从情感自发到组织自觉、从资源碎片到系统整合、从个体善念到公共善治的内生动力,从而在基层治理中实现了秩序与活力、制度与生活的高水平平衡。引导逻辑通过其体系性力量,确保社区慈善的公共性不因情感的多变而迷失,而是始终锚定在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目标上。其制度供给为情感能量的释放构建了规范化通道,使非正式的社会资本得以转化为可持续的治理资源;其氛围营造则通过意义生产,将慈善实践深化为公民美德的习得过程,为治理现代化奠定了主体性基础。生产逻辑则通过其内生性动力,为基层治理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情感动员打破了科层制治理常见的回应迟滞,实现了对社区需求的敏锐感知与快速响应;认同建构在个体与共同体之间建立了牢固的意义联结,生成了基于道德责任的治理共识;社会关系重塑则通过信任与网络的持续积累,构筑了社区应对风险挑战的深层韧性。这种双重逻辑的互嵌共促,使得社区慈善同时具备了行政体系的稳定性与社会自发力量的创造性,成为优化基层治理体系的战略性支点。

展望未来,社区慈善的双重逻辑互构模式对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具有深远意义。现代化人民城市的本质是以人为本的城市治理哲学,它要求城市发展既见物更见人,既重效率更重温度。社区慈善的引导逻辑,体现了党对城市治理的全面领导如何通过微观实践落地生根,将现代化人民城市的价值理念转化为具体可感的日常生活体验;而其生产逻辑,则彰显了城市居民作为治理主体所蕴含的巨大情感能量与创造潜力。在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的进程中,社区慈善通过激发居民的主体意识与参与精神,正在从三个维度重塑城市治理生态:一是优化公共服务的递送方式,通过情感认同与精准动员实现资源与需求的高效匹配;二是厚植城市社会资本,通过信任积累与网络构建增强城市的凝聚力与归属感;三是培育现代公民精神,通过持续的公共参与实践塑造具有共同体意识的责任公民。社区慈善作为联结国家与社会、制度与生活、理性与情感的关键节点,其发展深化将推动城市治理从传统的管理本位向现代的生活本位转型,为构建既有秩序又有活力、既具规模效率又富人文关怀的人民城市提供坚实的微观基础。推动社区慈善的高质量发展,本质上是为现代化人民城市构筑一种有温度的制度与有深度的治理,是实现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性支点。

(责任编辑:东 方)

increasingly salient , digital tools have emerged as a key means to accelerate knowledge flows and reconfigure innovation networks. Taking national societies affiliated with the China Association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AST) as the empirical setting , and building on the function of S&T societies in the 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 ,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mechanisms through which digital services influence the academic leadership.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overall level of digital services , as well as four dimensions , namely tangibles , empathy , assurance , and responsiveness , exert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s on academic leadership. Collaboration networks medi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igital services and academic leadership , while industry–university integration positively moderates the linkage between digital services and collaboration networks. These findings , both theoretically and empirically , illuminate pathways for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societies to enhance service effectiveness amid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nd provide empirical evidence for strengthening their academic leadership function.

Social Work in the Context of Charity Law: Its Governance Framework , Development Dilemmas and Institutional Response

Li Dejian • 76 •

Charity Law and its related policies provide an elementary governance framework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ocial work undertakings: its organizational law extends the legal scope of charitable purposes to be compatible with some social work organizations and protects those organizations' status; its activity law indirectly empowers and partly regulates social work through charitable service rules; and its promotion law creates supporting policies benefiting the social work undertakings indirectly and encouraging its integration with the charity undertakings. However , under this governance framework , social work is still facing a range of dilemmas relating to undue arrangements in terms of decentralization , management and service: the limited decentralization of the organizational law makes it difficult for a number of social work organizations to be registered as charities; the insufficient empowerment and management in the activity law may lead to the unbalanced interests affecting social workers and social work organizations involved in charitable projects; and the backward service of the promotion law hinders the development space for social workers in a charity. Thus , it is necessary to relax the standards for social work organisations to obtain charitable status by further extending charitable purposes and deleting strict policies; to optimise the distribution of legal rights and duties of social work organizations and social workers participating in charitable projects by legalising their legitimate interests and establishing fiduciary duties; and to improve the service system ensuring the development of charities' social workers by increasing minimum wage standards and implementing related supporting policies.

Guidance and Production: Mechanism and Path for Cultivating Intrinsic Motivation of Community Charity

Zhao Wenpin , Wan Zhibin • 88 •

Community philanthropy is an important practical carrier to promote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in the field of grass-root governance. Its effective operation depends on the dual drive and organic interaction of “the guiding logic of party building” and “the production logic of emotional construction”. The guiding logic of party building relies on the party's organizational network in system construction , transforming political potential into governance effectiveness; by designing rules in institutional supply , stable and predictable behavioral norms are formed; utilize cultural narrative and ritual performance in atmosphere creation to cultivate community identity. The production logic of emotional construction achieves the convergence of individual emotions into collective energy through emotional construction; promote emotional resonance through identity construction and elevate the awareness of moral community; by reshaping relationships , we can

continuously generate social capital such as trust , reciprocal norms , and community resilience. The mutual construction mode of “guidance production” presented by community charity not only transforms the value concept of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into specific governance practices at the micro level , but also realizes the unity of institutional order and social vitality at the macro level , providing theoretical enlightenment and practical path for building a new paradigm of social governance with both governance efficiency and humanistic temperature.

Deliberative Empowerment: The Mechanism of Precise Participation by Social Organizations in Social Assistance

Chen Shiyi • 104 •

Promoting the precise participation of social organizations in social assistance constitutes a pivotal pathway to tackling the last-mile predicament in social welfare delivery. Departing from the conventional logic of one-way empowerment or contractual collaboration , the government incentivizes social organizations to leverage their professional expertise through a consultative approach. Drawing on the theory of residual control rights , this paper develops an integrated analytical framework anchored in the core explanatory concept of consultative empowerment , aiming to unpack the internal mechanisms that underpin the effective and targeted engagement of social organizations in social assistance initiatives. The findings reveal that the materialization of such precise participation is essentially an outcome of the synergistic interplay of consultative empowerment across three interlocking dimensions: the allocation , exercise , and maintenance of residual control rights. Specifically , precise identification of aid recipients hinges on the government ´s endowment of residual control rights to social organizations via foundational consultation mechanisms , thereby advancing the localization , personalization , and dynamic updating of beneficiary targeting. Precise service provision is manifested in social organizations ´ exercise of residual control rights amid extensive multi-stakeholder consultations , which enhances the targeted efficiency of resource allocation and service delivery. Precise management is underpinned by social organizations ´ efforts to sustain residual control rights through ongoing consultative processes , enabling dynamic adjustments and systematic optimization of assistance frameworks and operational practices.

Relational Work and Its Pitfalls: Nonprofits ´ Participation in Government-Sponsored Voluntary Accreditation

Luo Wei , Zheng Wenjuan , Long Yan • 118 •

Around the world , voluntary programs are an increasingly prevalent regulatory instrument in governing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But accounts of mechanisms driving nonprofits ´ participation in those programs are underdeveloped. This article combines and expands insights from voluntary regulation and institutional work theories to examine the impact of government ´s informal relational work on nonprofits ´ regulatory participation. Drawing on interviews and survey data from a random sample of 203 nonprofits in Shenzhen , China , the authors study the country ´s pioneering government-sponsored voluntary accreditation program and its varying receptions among nonprofits. The empirical analysis shows that politically embedded nonprofits , those with closer organizational connections with the local government , are more likely to participate in accreditation. Since government agencies rely on existing regulatory networks to conduct relational work at both organizational and personal levels to persuade or cajole nonprofits to participate , they tend to direct their recruitment efforts towards more politically embedded nonprofits. However , these targeted recruitment practices may generate reactions much more complicated than the dichotomy of acceptance versus resistance , which ultimately facilitates some nonprofits seeking accreditation while deterring others.